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以人为核心”导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研究
——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例

范贝贝，李　瑾，冯　献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北京　100097）

摘　要：［目的／意义］“以人为核心”是新时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效能评价的重要准则。［方法／过程］立足政策与需求指向，本文构建了包括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文化获得感、文化幸福感 5 个维度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典型，开展了“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居于“中”等水平，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度水平最低，且组间参与度水平与文化获得感水平差异性较大，表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存在较大提升空间，建设较为不均衡。未来，需要从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结构和布局，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由普适性向精准化转变，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深入挖掘和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等方面入手，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服务效能；指标体系；生态涵养区；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G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248（2023）09-0080-11

引用本文：范贝贝，李瑾，冯献．“以人为核心”导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研究——以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报，2023，35(9)：80-90.

1 引　言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育乡风文明、提升农民文化自信、提高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具有积极意义。自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之后，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从顶层框架设计、基础设施建设、文化产品与服务供给、资金投入机制等方面不断完善，已经初步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覆盖“县 - 乡 - 村”三级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缺不缺、够不够”问题总体上得到解决。但是，受长期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与城市存在较大的差距，乡村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依然是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协同化发展的薄弱环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离“好”与“精”、从“总量”跨越到“质量”依然有较大差距，集中体现在服务效能上，如设施使用率不高、参与度

收稿日期：2023-08-08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数字治理视域下北京城乡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路径研究”（21SRC016）

作者简介：范贝贝（1988- ），博士，助理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乡村文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李瑾（1978- ），博士，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信息化。冯献（1986- ），博士，副研究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农业农村信息化

不足、获得感不足等。在新发展阶段，如何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将是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任务和重点、难点。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一直延续自上而下的行政化配置体制，这种行政命令式的决策机制从体制上决定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从根源上造成当前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足。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公民性和公平性性质特征决定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应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实现效能的提升就需要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将原先自上而下的“供给决定需求”转变为自下而上的“需求引导供给”，从根源上解决服务效能不足的问题。

目前学界对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供需对接、可及性、满意度水平、公共价值等维度。赖作莲[1]构建了涵盖公共文化投入、公共文化设施完备程度、文化设施使用程度等维度的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表明西部地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与东、中西部地区的差距正在慢慢缩小；冯献和李瑾[2]构建了包含可得性、可达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可适应性等 5 个维度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指标体系，并以北京为例，开展了评价指标体系应用；寇垠和刘杰磊[3]提出满意度是乡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的重要指标，发现东部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综合满意度水平有待结构性优化，数量满意度水平最高，质量满意度最低；倪永贵和许家豪[4]基于公共价值管理理论，从价值管理、运行能力和获得支持提出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路径；杨嬛等[5]构建了“主体 - 机制-效能”的分析框架，提出政府资源投入、村民参与程度和公共文化队伍和活动覆盖面是影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治理效能的主要因素。综观已有文献，已有研究的视角多数是基于政府投入产出视角或者效能评价的单一维度开展，以乡村居民为核心的全方位多视角的综合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较为缺乏，开展相关实证分析研究的更是寥寥。基于此，开展“以人为核心”视角下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选择典型区域进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探索总结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和关键着力点，提出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对策建议，将对“效能革命”阶段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　“以人为核心”：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的指向标

2.1　政策指向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在 2005 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发布之后才正式推动，在此之前多以“文化事业”概括相关内容，具体政策安排较少、内容单一且辐射面较小，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主要集中在乡镇文化站建设和电影放映上[6]。“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以及相关部委发布的政策文件中，核心要点是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步扩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源总量，重点内容是提升乡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和完善活动场所配置，此时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整体处于“出政策”“建机制”“提总量”的基本框架搭建阶段。进入“十三五”时期，《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等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相继推出，均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统筹考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和多样化文化需求，实现标准化和个性化服务的有机统一，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优质服务转变。虽然这些内容较为零散和笼统，政策关注重点依然在丰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和手段、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全覆盖等方面，但将“以人为核心”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效能评价标准已初露端倪。

迈入“十四五”时期，随着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不断完善和供给总量不断增加，乡村公共文化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服务相关政策开始向“高质量”“高水平”“高品质”的效能提升时代迈进。2021 年 4 月，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提质增效的关键是要融入城乡居民生活，提高群众知晓率、参与率和满意率，面向不同文化社群，开展形式多样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2021 年 11 月，《“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发布，首次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四大基本原则之一，并将精准对接人民群众文化需求，提升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深入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重需求侧管理作为核心任务，鼓励开展乡村节日民俗活动，举办“村晚”等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作为主要任务，完善“订单式”“菜单式”“预约式”服务机制。“以人为核心”，为乡村居民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已经成为新时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效能评价的重要准则。

2.2 需求指向

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其中农民对丰富文化生活的需求与城乡公共文化发展不均衡、乡村公共文化建设边缘化等问题之间的矛盾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在文化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公共属性的文化形态，具有深层的精神文化内涵与外化的物质文化形态，价值思考、规范秩序和文化活动是其基本内容[7]。基于此，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建设和效能提升，不能只是在文化产品供给和文化服务提供上进行简单的数量叠加，根植于农民日常生活中文化诉求响应才是其内核。受限于小农经济思想的保守、封闭与僵化以及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乡村文化长期处于城市工业文化影响的边缘化地位，城乡间文化交流形式逐渐演化为了单向的文化传递与被动接受[8]，乡土文化与乡村文化生活的需求空间不断被压缩。但是随着全面脱贫的收官、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城乡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乡村经济社会发展驶入“快车道”，乡村文化生态正在被重建，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也提出了多重需求。一是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催生了乡村居民对高品质文化生活的需求，开始追求文化生活的质量和精神境界的提升[9]，以及获得感、幸福感等“软需求”文化的满足，对公共文化服务质量的要求已经超越总量的扩大的态势；二是对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与设施的多样化、个性化需求。以送书、送戏、送电影等传统形式和活动为主向乡村居民提供的“套餐式”“格式化”公共文化服务已经不能满足乡村居民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如何把握乡土文化之魂，在空间设计、产品供给、活动、公共记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体现乡土味、亲情味、熟悉感和归宿感，创新传承乡土情结、社会心理和乡村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现代乡村居民找寻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根本依托[10]。新发展阶段之下，高品质、多元化、个性化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已经成为乡村文化生活的主流，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评价标准应与之相匹配、相适应。

3 “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3.1 指标选取

在“以人为核心”导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核心目标是顺应广大乡村居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满足精神文化生活的充盈与富足需求，而效能提升的核心路径同样也是依靠人民。更好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坚持文化发展依靠人民，充分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着力提高文化参与度和创造力。公共文化服务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不断提高。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公共文化服务，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提升文化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奠定基础。

基于“以人为核心”的发展原则，根据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内涵认识，以科学性、全面性、可比性、简便性、易操性为原则，经过领域内 3 次专家研讨，设计了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指标体系体系，从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文化获得感、文化幸福感等 5 个维度，设计了 17 个具体指标（表 1）。

表 1　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标解释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ndex interpretation

目标层	指标维度	具体指标	指标测算方法
乡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	知晓度	内容知晓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了解程度评价，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渠道知晓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获取的渠道的了解程度评价，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政策知晓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获取相关政策的了解程度评价，非常不了解=1，比较不了解=2，一般=3，比较了解=4，非常了解=5
	参与度	场所（设施）光顾频次	分项数值=村民每年到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频次，0 次=1，1~2 次=2，3~5 次=3，6~9 次=4，10 次及以上=5
		活动（服务）获取频次	分项数值=村民日常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频次，平均每周 1~2 次=1；平均每周 3~4 次=2；平均每天 1~2 次=3；平均每天 3~4 次=4；几乎时刻都在获取=5；
		互动反馈频次	分项数值=村民向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反馈服务感受的频次，从未反馈=1，几乎不反馈=2，偶尔反馈=3，遇到问题时反馈=4，经常反馈=5
	满意度	内容及时性满意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及时性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内容契合满意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契合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内容全面满意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全面性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服务质量满意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内容的质量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场所与设施满意度	分项数值=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与设施满意度评价，非常不满意=1，比较不满意=2，一般=3，比较满意=4，非常满意=5
	文化获得感	文化生活水平	分项数值=村民通过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业余文化生活水平提升程度的感知评价，完全未得到提升（甚至有反作用）=1，未得到提升=2，一般=3，得到了提升=4，得到了极大提升=5
		文化素养水平	分项数值=村民通过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文化素养提升程度的感知评价，完全未得到提升（甚至有反作用）=1，未得到提升=2，一般=3，得到了提升=4，得到了极大提升=5
		文艺技能水平	分项数值=村民通过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文艺技能提升程度的感知评价，完全未得到提升（甚至有反作用）=1，未得到提升=2，一般=3，得到了提升=4，得到了极大提升=5
	文化幸福感	文化认同感	分项数值=村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对文化认同感的评价，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认同，非常不认同=1，不认同=2，一般=3，认同=4，非常认同=5
		文化自信感	分项数值=村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对文化自信感的评价，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认同，非常不自信=1，不自信=2，一般=3，自信=4，非常自信=5
		文化满足感	分项数值=村民获取公共文化服务之后对文化满足感的评价，非常不满足=1，不满足=2，一般=3，满足=4，非常满足=5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①在知晓度维度上，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产品及活动等内容与渠道了解是其产生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前提与基础，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与保障政策的了解程度是以政府为主导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宣传推广效果的直观反映；②在参与度维度上，一方面应包括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场所或设施的利用程度，另一方面也需要涵盖村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的深度，场所（设施）光顾频次、活动（服务）获取频次与互动反馈频次 3 个指标可较为完整的对参与度进行表达；③在满意度维度上，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评价应包括服务内容、服务质量、服务场所 3 个方面，其中，村民对服务内容的满意度评价是重中之重，涵盖内容及时性、内容契合度、内容全面性等 3 方面的满意度评价；④在文化获得感维度上，获得感是一种心理体验，是在获取某种利益之后的满足感，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11,12]，文化获得感应涵盖文化生活、文化素养和文艺技能 3 个维度的具体指标；⑤在文化幸福感维度上，幸福感是一个综合评价指标，它是个体依据对生活满意度和情绪体验的一种综合评价[13]，具体到文化幸福感，应包括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感和文化满足感 3 个具体指标。

3.2 研究区概况

2005 年，北京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区县功能定位及评价指标的指导意见》，创新性的设立了生态涵养发展区；2017 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正式将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以及昌平区和房山区的山区确立为生态涵养区。数据显示，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约 1.11 万平方公里，约占北京市的 68%；现有 92 个乡镇、13 个街道；常住人口 256 万，其中农业人口约 106 万，约占全市的 47%。该区域是北京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首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区域，也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理念的重要方面。但是受制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限制，生态涵养区经济总量不足、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较为缓慢，已经成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敏感地区和“瓶颈”地带[14]。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分布不均衡、产品内容单一、供需脱节、基层文化人才短缺等问题较为突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不高、效能不足是生态涵养区与其他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体现，也是北京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典型缩影。开展“以人为核心”的服务效能评价，系统梳理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存量问题和增量需求，有针对性地提出补短板的措施，缩小生态涵养区与其他区域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差距，已经成为生态涵养区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基本需求。

3.3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22 年 10 月面向北京市生态涵养区核心地区（门头沟区、平谷区、怀柔区、密云区、延庆区）居住在乡镇和村庄的居民开展的问卷调研，共获取有效样本 700 份，每个区县样本 140 个。受访者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分区人口与面积数据来源于各区《2021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

3.4 数据可靠性分析

为确保问卷数据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研究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问卷量表数据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通过 SPSS 软件进行运算，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30>0.8，并通过了 Bartlett 检验（p=0.00<0.05），表明研究数据适合提取信息，因子分析一共提取出 5 个因子，且 17 个分析项对应的共同度值均 >0.4，研究项和因子之间有着较强的关联性，问卷量表数据信度较高，进而对 5 个因子，以及 17 个分析项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5 个因子对应的 AVE 值有均 >0.5，且 CR 值均 >0.7，表明问卷数据收敛效度较高。

3.5 指标测量与权重的确立

本研究中具体指标的数据均来源于问卷调研中乡村居民的主观感知和客观判断。其中，知晓度、满意

表 2 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基本情况统计

Table 2 Basic statistics of respondents i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项目	类别	样本数/个	占比/%	项目	类别	样本数/个	占比/%
性别	男性	367	52.43	家庭可支配收入	3 500 元以下	10	1.43
	女性	333	47.57		3 500~10 000 元	225	32.14
年龄	18~30 岁	151	21.57		10 000~30 000 元	289	41.29
	31~40 岁	336	48.00		30 000 元~50 000 元	132	18.86
	41~50 岁	166	23.71		50 000 元以上	44	6.29
	51~59 岁	41	5.86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8	1.14
	60 岁及以上	6	0.86		初中	99	14.14
职业类型	务农	432	61.71		高中/中专	261	37.29
	个体户/企业主	98	14.00		大专/本科	325	46.43
	企业工作人员	165	23.57		研究生及以上	7	1.00
	其他	5	0.71				

度、文化获得感和文化幸福等 4 个主观感知维度的指标，采用李克特 5 点量表法进行赋值，即由弱到强得分依次为“1、2、3、4、5”。对于参与度维度下的客观判断指标，如“每年到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频次”，则采用加总方式进行赋值。同时，为了平衡不同辖区之间人口和面积的差异对结果的影响，在计算各指标维度的综合得分时，将各区 2021 年人口密度 $d_k(k=1,2,3,4,5)$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各区的权重值 $\omega_k(k=1,2,3,4,5)$，$\omega_k(k=1,2,3,4,5)$的值可由公式（1）计算出：

$$\omega_k=\frac{d_k-min\{d_1,d_2,d_3,d_4,d_5\}}{max\{d_1,d_2,d_3,d_4,d_5\}-min\{d_1,d_2,d_3,d_4,d_5\}},\ k=1,2,3,4,5 \tag{1}$$

5 个区域的具体权重值详见表 3。

4 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评价方法与结果

4.1 评价方法

每个辖区内，一级指标的得分采用指数法进行标准化计算，将二级指标对应的问题得分进行平均，然后进行百分制标准化得分，具体公式为：

$$F_{ik}=\frac{\sum_{j=1}^{n_i}X_{ij}}{n_i}\times\frac{100}{N},\ i=1,2,\cdots,N,\ k=1,2,3,4,5 \tag{2}$$

其中，X_{ij}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的第 j 个二级指标问题的得分，n^i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下二级指标问题的个数，N 为一级指标的个数，k 表示不同的辖区。

最后，各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 F_i 为所有辖区下该

表 3 分区权重值

Table 3 Partition weight values

区域	面积/km²	人口/万	人口密度/（万人/km²）	权重值
怀柔	2 122.80	44.1	0.020 774 449	0.151 028 342
门头沟	1 447.85	39.3	0.027 143 696	0.197 332 185
平谷	948.00	45.7	0.048 206 751	0.350 458 668
密云	2 229.45	52.7	0.023 638 117	0.171 846 947
延庆	1 944.88	34.6	0.017 790 301	0.129 333 858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一级指标的加权平均值，权重 ω_k 可将各辖区的人口密度 d_k 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得到：

$$\omega_k=\frac{d_k-min\{d_1,d_2,d_3,d_4,d_5\}}{max\{d_1,d_2,d_3,d_4,d_5\}-min\{d_1,d_2,d_3,d_4,d_5\}},\ k=1,2,3,4,5$$

$$F_i=\sum_{k=1}^{5}\omega_k F_{ik} \tag{3}$$

对于各辖区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得分 $Y_k(k=1,2,3,4,5)$，可由下式直接得到：

$$Y_k=\frac{\sum_{i=1}^{N}F_{ik}}{N},\ k=1,2,3,4,5 \tag{4}$$

其中 F_{ik} 为第 i 个一级指标在第 k 个辖区的得分，N 为一级指标的个数，k 表示不同的辖区。

使用 SPSS 对各分区内一级指标的得分进行 ANOVA 方差分析，计算各一级指标的 P 值作为评价结果，一般认为 P 值小于 0.1 时，该指标在各组间具有显著性差异。

4.2 结果分析

参考 2022 年 9 月北京市颁布的《北京市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及各省市现行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综合绩效评价得分标准，本文将效能评价等级的分值划分为 4 个等级：优（$90 \leqslant S \leqslant 100$）、良（$80 \leqslant S \leqslant 90$）、中（$60 \leqslant S \leqslant 80$）、差（$S<60$）。根据前述评价方法计算，目前北京市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平均得分为 75.90 分，居于“中”等级，表明北京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整体效能水平仍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表 4）。

具体到每个维度来看，文化幸福感评分最高，为 82.38 分，位于“良”等级。从李克特 5 级量表看，乡村居民对于文化认同感、文化自信感、文化满足感的评分平均分别为 4.10、4.18、4.10，表明北京生态涵养区乡村居民文化幸福感指数较高。分析其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年来北京市全方位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阵地平台，实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行政村全覆盖，将“以文化人”作为核心工作目标，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增强了生态涵养区对主流文化的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同。同时，在生态涵养区大力开展乡土文化复兴行动或活动，深入挖掘和利用皇家文化、长城文化、宗教文化、史前文化、古城文化、农耕文化、红色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地域特色文化资源与内涵，以特色文化赋能了乡村各类产业升级，让村民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增值收益，提升了文化自信感和满足感。知晓度、满意度、文化获得感得分相当，分别为 79.47、78.87 和 77.46，接近“良”等级。其中，知晓度这一指标已经接近“优”这一等级，表明生态涵养区在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渠道与内容推广与宣传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参与度评分最低，为 61.31，接近“差”等级。从“场所或设施光顾频次”这一指标来看，44%的村民每年到访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的频次低于 5 次。“活动获取频次”这一指标统计表明，

表 4 北京生态涵养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结果

Table 4 Evaluation result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fficiency in Beij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一级指标	各区平均标准得分					各组加权平均值得分	组间差异显著性（P 值）
	延庆区	平谷区	密云区	门头沟区	怀柔区		
知晓度	80.05	77.71	79.76	81.24	80.38	79.47	0.127
参与度	61.52	63.10	58.81	60.90	60.38	61.31	0.074*
满意度	79.36	77.46	79.39	80.14	79.46	78.87	0.130
文化获得感	78.38	75.19	78.71	79.38	78.00	77.46	0.021**
文化幸福感	81.95	81.33	83.86	83.00	82.67	82.38	0.323
总得分	76.25	74.96	76.11	76.93	76.18	75.90	/

* 注：* 表示 10%显著性水平、** 表示 5%显著性水平

59%的受访村民日常获取公共文化服务的频次低于每周3~4次。参与度评分较低表明生态涵养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利用率不高，村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参与度较低，甚至部分公共文化设施、场所存在“闲置”状态，供给与利用存在较大的“鸿沟”，也从侧面反映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存在一定程度的“供需错位”和供给结构不优，已有的设施和产品不符合村民的口味[13]，导致村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从分区的得分结果来看，5个生态涵养区均在“中”等级，除平谷区得分相对较低（74.96份）之外，其余各区均在76分左右，得分较为均衡。但是，采用SPSS软件开展组间差异显著性分析发现，参与度与文化获得感两个维度指标差异性较为显著，P值分别为0.07和0.021。5个生态涵养区参与度得分分别为61.52（延庆区）、63.10（平谷区）、58.81（密云区）、60.90（门头沟区）、60.38（怀柔区），得分较为不均衡，尤其是密云区的评分等级甚至居于“差”等级。在文化获得感维度，平谷区的得分仅为75.19，距最高分79.38（门头沟）仍有一定差距。这表明，受经济发展水平、政府重视程度、宣传推广程度、需求差异度较大等多因素的影响，5个生态涵养区之间乡村居民的公共文化服务参与程度和文化获得感评价存在较大差异，生态涵养区各区之间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水平存在差距，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依然较为不均衡。

5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策略

“以人为核心”为导向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人人参与、全民共享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满足乡村居民对美好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使公共文化服务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挥更大作用。面对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度较低与区域效能水平不均衡等问题，本文从以下4个方面提出在“以人为核心”导向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策略。

5.1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结构和布局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结构和布局不合理是乡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度较低的主要因素之一。部分基层政府按照统一标准和规划在行政村、自然村建设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与设施，类型、数量和规模上简单的“一刀切”，导致资源分布不均衡、不合理，出现村民想参与时无设施，或设施不符合自身需求[15]。因此，需要按照空间结构、人口规模变化等特征，全面布局、合理配置区域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场所与设施，提升设施与场所利用率。结合小数据（调查问卷）和基于位置的兴趣点数据（Point of Interest，POI）、手机轨迹数据、物联网设备、视频监控数据等大数据，通过构建空间模型，叠加分析乡村居民常用的文化服务设施的空间分布、服务半径、居住用地、人群活动等，以县域为单元，全面掌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存量和使用状况，量化评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覆盖能力与服务能力。基于村民使用热度、年龄、偏好等大数据[16]，进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如村级图书馆、文化礼堂、文化传习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设施布设，与乡村居民公共活动较为集中的健身场所、休闲广场等场所进行组合、集聚与融合，拓展文化服务功能，构筑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服务圈，实现数据驱动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精准化布局、设施共建共享、资源按需配置。

5.2　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由普适性向精准化转变

当前由政府供给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产品以基础性的乡镇综合文化站、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农家书屋、戏曲下乡为主，而这些空间中多数仅简单配套图书、健身器材等设施，已经无法满足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导致乡村居民参与积极性不高。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乡下人在城里人眼睛里是‘愚’的，并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17]。“愚”不是指农民智力不及人，而是说他们文化知识不及人，更是指对自身的文化权利和需求处于忽视状态。因此，在积极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背景下，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整合县域美术馆、文化馆（站）、图书馆等资源，搭建省级县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域公共文化服务云平台，并与国家公共文化云、省级文化云等平台进行充分对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畅通乡村居民需求表达渠道和反馈机制，让乡村居民拥有文化需求的表达权、参与权及话语权，根据需求更新优化服务清单，促进乡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点单”“送单”常态化。

5.3 构建多层次、多渠道的公共文化供给机制

中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从制度设计、服务内容到服务渠道与方式均由政府负责。政府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还是评估者，这种单一的供给机制导致了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产品同质化严重，乡村居民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其能动性等不到激发，致使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低下甚至无效[18]。因此，要转变传统的政府主导的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理念和投入模式，加快实现由“行政化管理”向“社会化”管理转变，加快推动社会资本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投入和市场化运营。围绕乡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多层次、多样化公共文化服务需求，降低准入门槛，以社会资本投入运营、社会资本与政府合作、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19]。同时，建立严格的市场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监督管理与绩效评估体系，全程全面对其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能力和水平进行跟踪与评价，确保市场主体参与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5.4 深入挖掘和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中国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建设主要以城镇居民的文化需求为主，乡村居民则是被动享受从城市流入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且由于乡村居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不高，文化品位对比城市居民层次较低，以城市为核心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已经无法获得乡村居民的认可，导致城乡之间、地域之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水平不均衡。因此，亟需转变用城市文化覆盖乡村文化的行动惯性，从乡村内生文化挖掘和创新入手，整合农村优秀传统文化优势资源如农耕文化、传统民俗、少数民族文化、生态文化等[20]，扩展公共文化服务种类塑造与乡村社会发展和乡民实际需求具有价值共振的地方性、个性化的文化标签，通过通俗易通、贴近农业生产生活的“广场舞”、传统戏曲、“村晚”等活动，让乡村居民能享受到与自己品位相符合、文化需求相契合的公共文化服务，在此过程中产生不同层次的文化获得感。

参考文献：

[1] 赖作莲. 公众需求视角下的西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9(5): 58-62.
LAI Z L. Evaluation on the efficiency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western rur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demand[J]. Journal of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9, 39(5): 58-62.

[2] 冯献, 李瑾. 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 指标体系设计与评价应用[J]. 图书馆, 2020(11): 20-26, 32.
FENG X, LI J. Accessibility to public culture service in rural area: Index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application [J]. Library, 2020(11): 20-26, 32.

[3] 寇垠, 刘杰磊. 东部农村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J]. 图书馆论坛, 2019, 39(11): 79-86.
KOU Y, LIU J L. Research on eastern rural residents' satisfaction to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J]. Library tribune, 2019, 39(11): 79-86.

[4] 倪永贵, 许家豪. 公共价值视域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路径——基于F市村图书馆的调研[J].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 2023, 43(2): 120-124.
NI Y G, XU J H. Way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ublic value -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F city village library[J]. Journal of Hubei engineering university, 2023, 43(2): 120-124.

[5] 杨嬛, 黄雅奥, 王家合.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协同治理机制与效能研究——基于H省X县的实证分析[J]. 图书馆, 2021(6): 35-43.
YANG X, HUANG Y A, WANG J H.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and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Based on empirical analysis of X county in H province[J]. Library, 2021(6): 35-43.

[6] 许丹, 陈果. 中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变迁研究——以制度变迁为分析框架[J]. 社会科学, 2021(3): 28-39.
XU D, CHEN G. Research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China - Based o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J].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1(3): 28-39.

[7] 李毅, 荆林波. 新时代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功能目标及其实践路向[J]. 甘肃社会科学, 2020(5): 193-199.
LI Y, JING L B. Functional goal and realizing dire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J].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20(5): 193-199.

[8] 万军杰, 王文浩. 新发展阶段的乡村文化振兴: 困境、方略与路径[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5(4): 63-68.
WAN J J, WANG W H.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Problems, strategies and pathways[J]. Journal of Hebei normal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45(4): 63-68.

[9] 刘涛. “十四五”时期乡村文化振兴的主体、机制及图景——基于河南省 M 村老年人文化协会的考察[J]. 河南社会科学, 2023, 31(4): 116-124.
LIU T. Research on the main body, mechanism and path of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culture in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an investigation by the old people's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M village, Henan province[J]. Henan social sciences, 2023, 31(4): 116-124.

[10] 黄文记. 乡村振兴视域下地情文化资源服务乡村公共文化“内生”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四川戏剧, 2022(12): 166-168.
HUANG W J. The logic and path of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serving th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Sichuan drama, 2022(12): 166-168.

[11] 孔德永, 韩园园. 新时代农民文化获得感的生成逻辑与实现机制[J]. 学习论坛, 2021, 37(4): 99-105.
KONG D Y, HAN Y Y. The generative logic and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on cultural acquisition of farmers in the new era[J]. Tribune of study, 2021, 37(4): 99-105.

[12] 阳清, 郑永君. 乡村文化振兴中农民获得感的形成路径研究——基于村干部素质、政策感知及政策参与的视角[J]. 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40(1): 37-49, 126.
YANG Q, ZHENG Y J. Formation path of farmer's sense of policy gain in rural culture rejuv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llage cadre's quality, policy perception, and policy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Jiangha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3, 40 (1): 37-49, 126.

[13] 廖雯玲, 白清心. 历史和现实双重视角下中国基层图书馆属性和功能定位[J]. 农业图书情报学报, 2022, 34(5): 57-66.
LIAO W L, BAI Q X. The attribute and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China's grass-Roots libraries from the dual perspectives of history and the new era[J].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in agriculture, 2022, 34(5): 57-66.

[14] 谢明义, 徐广才, 张蕊. 生态涵养区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耦合协调研究——以北京市怀柔区为例[J]. 生态经济, 2021, 37(5): 119-124.
XIE M Y, XU G C, ZHANG R.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Taking Huairou district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J]. Ecological economy, 2021, 37(5): 119-124.

[15] 罗娟. 过程型逻辑: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的实现机制[J]. 农村经济, 2022(10): 82-90.
LUO J. Process logic: The realization mechanism of accessibilit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village construction[J]. Rural economy, 2022(10): 82-90.

[16] 张若星. 乡村振兴视角下乡村文化空间重构研究进展与展望[J]. 人文地理, 2023, 38(2): 35-43.
ZHANG R X.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research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cultural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J]. Human geography, 2023, 38(2): 35-43.

[17] 费孝通. 乡土中国: 插图本[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FEI X T. Local China: Illustrated book[M]. Beijing: Zhong Hua Book Company, 2013.

[18] 李少惠, 邢磊. 社会组织嵌入: 农村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路径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 2021(10): 32-38.
LI S H, XING L. Social organization embedment: Research on the path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21(10): 32-38.

[19] 范红丽, 杨嘉乐, 张晓慧. 社会文化组织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DOI：10.13998/j.cnki.issn1002-1248.23-0505

2022(4): 170-184.

FAN H L, YANG J L, ZHANG X H. The impact of social cultural organizations on rural residents' happiness: AnAnalysis based on DataAnalysis from CLDS survey[J]. China rural survey, 2022(4): 170-184.

[20] 罗哲, 唐迩丹.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转型: 从"城市文化下乡"到"乡村文化振兴"[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6(5): 129-135.

LUO Z, TANG E 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rom "giving urban culture to the countryside directly" to "revitalized local rural culture"[J]. Journal of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2019, 46(5): 129-135.

Effectiveness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People-Oriented": Tak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of Beijing as an Example

FAN Beibei, LI Jin, FENG Xia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Sciences, Beijing 100097)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People-centered" i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n the new period and the important criterion of efficiency evaluation.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with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ramework and the continuous increase of the total supply, the relevant policies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ve begun to move toward the era of "high-quality", "high level" and "high quality" efficiency improvement.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policy and demand orientation, 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ffectiveness, and designed 17 specific indicators from 5 dimensions, such as awareness, participation, satisfaction, sense of cultural acquisition, and cultural happiness, and takes the Beijing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as a typical example to carry out the "people-centered" efficiency evalua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Results/Conclusions] At present, the average score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efficiency in Beijing'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is 75.90 points, which is in the "medium" level, indicating that the overall efficiency level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in Beijing's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still has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participation score is the lowest, and there is a large difference in the participation level and the sense of cultural acquisition level among groups, indicating that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has a large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is unbalanced. The ultimate goal of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guided by "people-oriented" is to build a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with everyone's participation and shared by all, meet the new expectations of rural residents for a better spiritual and cultural life, and mak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play a great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and layou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facilities,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products from universal to precise, build a multi-level and multi-channel public cultural supply mechanism, and deeply explore and innovate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local culture,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level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Keyword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service effectiveness; index system;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rea; rural revitalization